

#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9月下旬,秋雨绵绵,天气转冷,而义勇队第二总队的后勤补给出现了问题,游击队员们吃不上、喝不上,身上还穿着夏天的单衣,夜里冻得浑身打哆嗦,战士负伤了不能治疗,子弹打光了难以补充,士气十分低落。而王献臣又在请求县城里的日军来解围,这仗实在无法再打下去了。

讨逆战役在进行了两个月之后,李贞乾召集讨逆联军指挥部开会,决定和“王歪鼻子”罢战议和,双方停战,交换俘虏。“王歪鼻子”气焰嚣张,他让人转告李贞乾说:“你们枪炮跟不上,也不会打仗,还想找我的麻烦,我要把你们赶出丰县!”

9月20日,双方停战,交换俘虏,第一次讨王战斗遂告结束。王献臣在徐州活动,向日军报告丰县、沛县抗日部队的情况,被日军委任为“丰沛剿共司令、救国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11月29日,王献臣趾高气扬地带着日军配送的一批枪支和5万发子弹回到丰县,公开当了汉奸。

义勇队第二总队离开丰县,分成了三支:一支是李砥平带领的萧县十七大队、十八大队仍回南面的萧县;另一支是大队长李贞乾在外号“尹和尚”的砀山县特支书记尹夷僧的邀请下,准备到西面的砀山县孟楼一带打游击;第三支是政委郭影秋带着沛县第五大队和金乡的第十三大队去北面的金乡一带打游击。义勇队之所以分兵几路,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兵源、多搞些枪,更主要的是需要搞给养,弄些棉衣鞋袜,分散开来比较好筹集;另一方面也想休整一下,进行思想教育,因为部队刚搞起来就大打仗,而且没有打好,战士思想比较混乱,需要进行抗战必胜和纪律方面的教育。

在讨伐王献臣之前,李贞乾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具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战役失败后,他仍然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再一次向中共苏鲁豫特委书记王文彬提出了入党的强烈愿望,

经王文彬介绍,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批准,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入党后,又积极动员其未满16岁的七弟李秉良参加了抗日义勇队,并为之改名为李光路,两个女儿的名字分别改为李勤、李俭,表示全家跟共产党克勤克俭走革命道路的坚定信念。

临分开之前,李贞乾专门建立了丰县二区抗日民主政权,并组建区中队和抗日联军,驻扎在李新庄、闵陈庄等村,切断了王献臣大本营与县城日伪之间的联络要道。

仗打输了,队伍中开小差的人很多,从特委班子到游击队员都很消沉,组织部长白子明也唉声叹气,说这一仗根本不该打,影响了一部分人的士气。郭影秋想起自己在沛县监狱和徐州监狱里所受的生死折磨,心想,这一仗也不能算打输了,只是没打赢而已,这点挫折算什么?于是一再向大家解释说:“我们这一次不是失败了,而是暂时的战略转移,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而且这场战役还很有正面意义,使湖西人民认清了汉奸王献臣的丑恶面目,对广大群众是一次抗日反奸的有力教育,是湖西地区抗战初期由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型的反奸抗日军事行动!”

郭影秋的话,给一些人拨开了心头的迷雾,让大家心里亮堂多了。

苏鲁豫特委书记王文彬等人没有随着部队离开丰县,他们转入地下,到王文彬的家乡丰县第三区王寨村一带坚持斗争。王文彬安排组织部长白子明去山东沂水县一趟,一定要想办法找到驻扎在那里的上级省委,汇报湖西的情况,介绍当前遇到的困难,请求上级派来一些军事干部或者八路军战士,来湖西指导和帮助义勇队打仗。王文彬告诉白子明:“无论多么困难,我都不会离开这里,一直会坚持在这一带活动,等着你带回来上级党组织的指示。”

(未完待续)

## 一词一句

### 反求诸己

反省自己的言行与内心。“反求诸己”是孟子提出的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孟子秉承了儒家的主张,认为人的德行与功业的确立,从根本上取决于自身的修养。因此,如果自己的言语行事不能获得认可与赞赏,不应归咎于他人的误解,而应反省自己的言行与内心是否符合道德、礼法的要求。

#### 引例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

翻译:仁者就好比射箭的人一样,射箭的人要首先端正自己的姿势然后发箭,发箭没有射中目标,不埋怨成绩超过自己的人,而是反躬自省而已。

(来源:中国青年报)



掌故知鲁

### 曲阜碑刻(八十七)

## 明嘉靖三十五年孔闻韶墓碑

张镜毅

鸢集》,成为明代尊孔崇儒的生动见证。

孔闻韶最核心的功绩,当属“移城卫庙”这一影响曲阜城市格局的重大举措。据《城阙里记碑》记载,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正月,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攻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数百,虐焰所及,不崇朝县治为墟”,当晚便移营进阙里,“秣马于庭,污书于池”。虽庙宇林墓侥幸保全,但孔氏族属四散奔逃,阙里陷入岌岌可危之境。当时官府曾遣兵四百戍守,但敌众我寡,士兵望风而溃,根本无法形成有效防御。危急时刻,时任按察使潘珍提出“县庙必相须以守,盍即庙为城而移县附之”的关键提议,孔闻韶极力响应支持,联合各方力量推动此事。科道官员在当地纪功时亦上书朝廷请求移城,经抚按等部门一致赞同,最终获皇帝下诏批准。工程于正德八年七月开工,嘉靖元年春三月竣工,历时将近九年建成。新城周长八里三十六步,征用农闲丁夫万人,耗资白银三万五千八百两有余,资金多来自各部门结余,同时募集富商义士资金。新城

在曲阜孔林苍松翠柏的掩映下,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孔闻韶墓碑静静矗立。作为孔子第六十二代嫡孙、袭封衍圣公孔闻韶的陵寝标识,这座墓碑不仅以恢弘形制彰显着明代一品官阶的礼制规格,更以铭文为线索,串联起圣裔功绩、政治联姻、艺术风格与社会经济等多重历史维度。

孔闻韶墓碑的每一处细节,都严格遵循明代丧葬制度与孔氏家族宗法秩序。墓碑立石时间标注为“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吉日”,距墓主逝世恰好十年,精准契合明代“卒后十年立碑”的丧葬礼制。其选址恪守孔林“左昭右穆”的安葬传统,紧邻其父孔弘绪之墓,形成清晰的家族墓葬谱系,彰显“敬宗法祖”的伦理核心。从形制规格来看,该碑尽显衍圣公“一品官阶”的尊崇地位。碑身形制为明代典型螭首碑,通高390厘米、宽121厘米、厚35厘米,历经风雨仍基本完好。碑首浮雕二龙戏珠纹饰,龙身腾跃、祥云缭绕,线条遒劲流畅,展现明代中期宫廷造碑的精湛工艺;额部篆书“大明”二字端庄雄浑,周边环绕云龙纹边框,彰显皇家对孔氏家族的特殊礼遇。碑座为传统夔凤造型,虽部分埋于地下、细节略有磨损,但整体形制完整,完全符合《明会典》中一品官员墓碑的制式要求。

孔闻韶(公元1482年至1546年),字知德,号成庵,其一生功绩与明代中期的儒学传承、地方治理紧密相连。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21岁的孔闻韶进京朝觐,袭封衍圣公,获明孝宗亲赐玉带、麒麟服,朝廷特加孔氏世袭太常博士、翰林院五经博士各一人,并敕令重修衍圣公府。在孔闻韶返回曲阜前,朝中士大夫纷纷赠诗送行,诗作汇集为《振

建成后,“高塘深沟,与泰山洙泗映带而萦回”,孔府居中,县治、儒校、市廛等环列四周,形成“庙城合一”的防御体系,彻底改变了阙里孤旷无守的局面,奠定了今日曲阜明故城的基础。

此外,孔闻韶还主导了弘治十三年至十七年的孔庙大规模重修,工程历时约五年,耗资白银十五万二千两,使大成殿、奎文阁等核心建筑达到今日规模,明孝宗特遣内阁首辅李东阳祭告孔子并御制碑文纪功。在家族治理上,孔闻韶于正德三年上疏朝廷,请求免除孔氏家族三百六十九顷六十八亩田赋,获武宗批准,缓解了圣裔贫困问题;同年奏请设立尼山、洙泗两书院学录,举荐弟弟孔闻礼主持子思子庙祀并使孔闻礼获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开创“衍圣公之弟世袭五经博士”制度,为后世沿用。

如今,孔闻韶墓碑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林的核心遗存,得到了妥善保护。碑身基本完好,铭文清晰可辨,仅碑座部分埋于地下、少量纹饰因风化略有磨损。文物部门已采取围栏保护、定期清洁等措施,同时通过数字化扫描、拓片存档等现代技术,实现碑文信息的永久保存。作为孔林“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孔闻韶墓碑承载的不仅是一位圣裔的生平,更是明代礼制、政治、艺术、社会的浓缩写照。从碑制中的礼制规范,到墓主的文脉守护,再到石碑本身的艺术价值,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四百余年前的家国故事。如今,它依然静静矗立,在苍松翠柏间与古今对话,让我们得以透过碑石的纹理,读懂明代的尊孔传统、圣裔担当与社会风云,其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也将在世代传承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